



凌雲健筆意縱橫
月旦政經四十年



林行止專訪

■ 文：錢景亮

讀者在上期已瞻仰過董橋、黃國彬、何福仁三位大家的丰采。這次我們請到享譽香江的報人林行止先生談童年經歷，論文章之道，讀者想必也會獲益良多。

林先生於1973年創辦《信報》，自此直至1996年稍，每天耕耘社論「政經短評」，二十多年來議人論事，剴切事理，不少港人奉為洞識政情局勢，掌握經濟脈搏的圭臬。林先生柔翰至今依舊矯健，在《信報》撰寫「林行止專欄」，筆墨結集已有一百二十多本，獲譽為「香江第一健筆」。他倒輕描淡寫說所謂「香江第一健筆」不過是「沒有科學根據的溢美之詞」，備受推崇、稱健之故，不是寫得出色，無非長寫長有，一寫四十年！

流落街頭 飽嘗世情

林行止先生四十年來縱橫筆海，月旦中外政事，批點環球經濟，六十年代曾負笈英國劍橋工業學院攻讀經濟學，經濟學的種種學說和理論自然了然在胸。經濟學有一重要概念名「機會成本」，大概意思就是說但凡取捨必有得亦有失，抉擇時考慮機會成本有助衡量得失輕重，從而選失之最少者。林先生對此概念體會至深，緣於童年時在大陸的經歷。

林先生1940年生於潮州澄海，在當地讀小學和初中。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，父親赴港工作，母親則與林先生及其三名弟妹居於澄海郊區。幾年後，母親遭當局以涉嫌當間諜的罪名逮捕，卻從無正式起訴和審判，一年半後獲「無罪釋放」。母親遽然無辜陷獄，遺下幼孩四人，么兒不過三四歲；林先生身為長子，一力肩負照顧弟妹的重責。當年的政治環境風聲鶴唳，為免人口實，親戚全都避而遠之，兄妹四人上門求援不單遭受白眼，更常吃閉門羹。四人苦無生計，最後流落街道，拾荒維生。那時汕頭外馬路新華戲院剛落成，大門前的石階寬敞無比，便成了兄妹四人的棲身之所。後來兩個妹妹寄居父母一老同學家中當女婢，林先生和弟弟二人則住進拾荒街童自搭的竹棚，靠賣破爛來換些殘羹冷飯，偶爾從垃圾堆中檢獲一枝廢棄的塑膠牙刷，便如拾至寶，足夠兄弟二人樂上半天！

「一年多的流離失所，是一生揮之不去的陰影，至今偶然途經垃圾站聞到那股氣味，還有說不出的感喟；不過，其間的苦頭令我深切體會一旦法治薄弱、官員胡作非為、社會失序，老百姓生活便如陷水火、苦不堪言……。母親入獄期間，家裏的東西全部被盜、被竊、被搶，四個小孩身無長物，卻被當權幹部掃地出門。可是，母親獲釋後，政府並未作過一分一毫的賠償或資助。

「當年日子雖然徬徨，其實也有所得，就是領略過苦中作樂的滋味：拾荒時我和弟弟住寮屋，木板牆壁，竹葉屋頂，真正是雨打日曬。尚記得當年在垃圾收集區討生活的小孩自編的『童謠』有這二句歌詞：『日出雞卵影，落雨擺砵仔』，形容晴天時陽光透過竹葉編織的玻漏屋頂，投於泥地的影子如雞蛋大小，而在下雨天，雨水入屋，人們必須以小器皿盛載雨水的景況。

「這一年多流離失所的生活令我明白到正如鐘擺迴盪有兩頭，樂極亦可生悲，於是不去追求大起大落的刺激；這種尋常是福的取態，間接影響到我的學習與工作態度。因為尋常，所以不嫌刻板、不避重複、不怕沉悶，做起事來便較為堅毅和專注。」

林先生和幼弟後為一位屠狗宰貓沿街叫賣的小販「善叔」收留，其大恩大德，林先生沒身不忘；善叔當年無懼牽連，收容兄弟二人，林先生認為這個決定甚至世間大多數決定的由來，都離不開機會成本。

「仗義每多屠狗輩，當年的恩人剛巧是宰狗屠貓的。其後涉獵經濟學，認識機會成本這回事，明白凡事都得考慮機會成本的高低。當年母親涉嫌當特務而身陷囹圄，親友怕遭連累，避之惟恐不及，此非不安好心，而是為勢所逼；屠狗輩沒有家小財產，機會成本較低，伸出援手，所冒風險不高。而這正好反證擁有愈多的人，愈要有推己及人的素養，才不致為富不仁。簡言之，本性善惡與機會成本高低要一併考慮，如此才較易於察人觀事。」

尊重知識 格物致知

林行止先生多年來在《信報》撰寫社論和專欄，立場鮮明，劉紹銘教授說林先生這些「議論



縱橫」的作品已「在香港社會的知識與領導階層建立了傲人的公信力」。林先生的公信力莫基於評論獨立中肯，不囿權威之名；「字裏行間時見逆耳之言」是事實，只因「春秋之筆，亦合該如是。」劉教授如是說。

劉教授也說林先生是個務實作家：「務實作家不信口雌黃，事事講求言之有物。林行止『香江第一健筆』的美譽，就是建立於這種誠信的基礎上。」這位務實作家的大塊文章觸及經濟、社會、政治、文化，旁徵博引，信而有徵，倒坦白招認當年在汕頭唸小學（廣州旅汕小學）和中學（華僑中學）時品學俱劣；母親出獄後當上縫紉工人幫補生計，一心冀望子女成才，卻因長子無心向學而常給召至學校「受訓」。這位當年教人頭痛的學生卻原來自有見解。

「我現在仍清楚記得初中的科學課本，指世上一切科技包括電話、電報、留聲機的發明人清一色是蘇聯人，這當然不能入信；而對於每日必修的時事政治課，更覺其胡說八道，因此毫無興趣。當年有一份叫《實話報》的刊物，除了專有名詞和標點符號，可說無一句不是謊話。這種背景是我的成績除了作文外，無法合格的底因。來港後我才重拾讀書的樂趣與興趣。

「我生性不大服從權威，就學與自學，都是以尊重知識為出發點。」

林先生謙稱因報館運作分秒必爭，無暇尋章摘句，故此「文風粗糙」。他說自己不曾刻意經營文字，只求「盡知順性」：講求理性分析的評論文章要經冷靜思考始成，一旦感情過於澎湃，便不

容易冷靜拿捏、理性分析。「也許我是受了《文心雕龍·辨騷》批評有些學習屈原的人為『中巧者獵其豔辭』的影響，作者劉勰認為內容遠較華麗工整的詞藻重要，我深然斯說。」

林先生縱橫筆海四十年，多次鄭重表示評論文章雖無統一衡量優劣的標準，但大致該做到及時應景、辨識真偽、判別優劣。評論者則應該勤懇致知，廣納知識，更須備自主中肯的態度，獨立思考，而不應追求放眼四野的中立，企想面面圓融。評論者還須緊記兼容並蓄，有容乃大，切忌盲從權威，目無餘子，自以為獨步天下，立論無懈可擊便故步自封。

林先生道出四十年來撰寫評論文章一直恪遵的四大準則：

一、在資訊爆炸年代，論題須執中扼要，故應先經慎重篩選，其中當然涉及價值判斷問題；

二、資訊太多，因此文章和觀點難以全備，即使主觀上力求客觀，心中也要緊記那僅是一方之見、一己所納；

三、專業和理性的論題即使輔以生活化的實例加以引申、佐證，但羣疑難釋，仍要尋求學術研究和歷史觀點以增添說服力；

四、社會科學，尤其是經濟學，講求局限、對應、變化，只有較佳或較差的思慮，沒有追求真理的決絕，這意味在學術國度裏沒有王者。認識這一點可令時評者不致偏執一詞，理直氣壯，亦不會迷倒於某種學說或某個學者下，致使過猶不及，擇『善』固執。

浮生養閑 寧靜致遠

報館運作夜以繼日，工作異常繁重，當年林先生與夫人筭路藍縷，草創《信報》，資金微薄，虧損嚴重，即使後來《信報》漸上軌道，林先生還是不得清閑，除了負責每日一篇的社論，也總攬和縱覽《信報》和《信報月刊》的編務，親自發掘作者、邀稿、審稿，每晚睡不過五個鐘頭，惟一的消遣娛樂就是讀「閑書」！1965年，林先生赴英國劍橋研讀經濟學，認識了一位正攻讀物理學博士的香港人黃君，他對林先生的影響甚深。林先生回憶道：「當時香港的學生不多，因此我們經常見面聊天；黃君學識淵博，他的專業我一竅不通，而我的所學他知道的卻比我還多。我問他何來這樣的能耐，他說這是他養成『一出圖書館便不看本科書的習慣』使然。我覺得大有道理，從此遵行，在家只看雜書閑書。這種習慣令我寫非時事評論文章時仿如信手拈來，得心應手。」

林先生讀閑書其實可不得閑，他嘲笑自己天性喜歡「自尋煩惱」，讀閑書還要千方百計為書中每項資料稽查緣由，但求水落石出；他讀英國雜誌《笑林》*Punch* 竟大費周折找創刊號來讀，說「對其演變史以至編輯的生平亦深感興趣」云云！林先生還會根據所讀的「閑書」寫文章，他統稱這些作品為「閑讀閑筆」。這些作品的題目涉及古今中外，倒也體現林先生一貫的作風：事事考查，數據翔實。如〈英國人與茶〉一文，有關英國茶道資料之多，體會之深，使黃維樑教授讀之而讚歎，說讀了此文，方知茶對英國人有多重要。近作〈披頭不是甲蟲 左獅不同右獅〉洋洋二千多字大寫搖滾樂隊披頭四和中環滙豐銀行大廈門前兩

隻銅獅的歷史。文章緣起是林先生讀了法國《世界外交月報》一篇有關菲律賓「女傭出口業」的特稿，文章提及滙豐銀行門前二獅，卻語焉不詳，他又禁不住尋根究底，翻查滙豐銀行上百年的歷史檔案庫，終找出相關資料，寫成文章，稱作「閑讀偶拾」！

林行止先生從不以經濟學家自居，說自己不過是個「致力於普及經濟知識的傳媒人」。他在1991年獲英女皇頒授官佐勳章，1999年獲嶺南大學授與榮譽博士銜，2009年獲香港大學頒授名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，2011年獲樹仁大學頒授社會科學榮譽博士學位，至今仍堅守文人的本質和本份，至今「從文字吸納知識幫助思考，藉文字表達想法和看法」。

劉紹銘教授說林行止先生的寫作方向是提供資訊，傳授知識。廣大讀者當然期望繼續讀林先生的作品，是千錘百鍊的評論文章也好，是閑讀偶拾的戲作也好，讀者從中均能吸收資訊，繼承知識；但讀者想必更殷殷盼望林先生能從寫文章、讀閑書中偷出一點閑，寫寫他這麼不得閑又這麼得閑的一生。不知林先生可有這點閑去寫這本傳記？

